



南非共和國的處變與應變



楊達泰

辛巴勃威獨立後南部非洲的現實

一九八〇年五月四日，莫加貝在羅德西亞的選舉中獲勝，將南部非洲帶到一個新時代的門檻。就南非共和國而言，它必須澄清的最重要問題是：在南非是否能找到使這個多元社會的所有人民均感滿足的生活方式 (a *modus vivendi*)。

莫加貝自稱為馬克斯主義者。可是惟有時間才能顯示他所受的馬列主義影響究有多深，或者他只是利用馬列主義來動員羣衆的支持而已。根據一般所知，莫斯科所支持的是恩柯穆，所以對莫加貝的勝利，已感到失望。目前的問題是：莫斯科是否會運用力量來使恩柯穆掌握政權，或者是試圖增加對莫加貝政府的影響力，因為西方有更大的能力提供必須的資金和技術，所以莫斯科企圖經由經濟援助來達到此項目的，比較困難。蘇俄將盡一切努力來製造一種對南非的恐懼感，其最好的途徑就是挑逗南非的軍事反應。目前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史密斯政府時代的華爾斯將軍 (General Walls) 留任為辛巴勃威軍事指揮官。由於華爾斯將軍本身永遠不會構成對莫加貝的政治威脅，只要華爾斯將軍能保持他的權威，莫加貝便不會像莫三鼻克的馬夏爾總統等那樣完全依賴蘇俄的軍事力量來維持他的地位。

在長遠的將來可能發生什麼？辛巴勃威是否會變成一個純粹的「人民共和國」而成為攻擊南非的跳板？這個巨大問題的陰影現正籠罩着南非共和國。南非有識之士認為：對環繞着南非周圍的現實產生幻覺或是愚昧無知，才是最大的敵人。他們認為辛巴勃威的「革命」尚未完成。短視地作出輕率的結論，殊為危險①。

註① Dr. G. M.E. Leisner, "South Africa after 4 May 1980" *Africa Insight* (incorporating Th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African Affairs) (Vol. 10, No. 1, 1980) pp. 2-3.

辛巴勃威的獨立對南非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莫加貝曾明白表示：他雖然完全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但他的國家不會成為遊擊基地來攻擊南非，兩國的商業將繼續下去。用南非的成語來說：他的政府將採取的如果不是善隣政策的話，至少是一個正確的毗隣政策，這是短程的情況；南非必須嚴肅考慮的是其長程的影響。

辛巴勃威大選結果揭曉之後，南非就有被疏遠之感，國會議員們在復活節休會時就意識到包沙總理的「星座國家」(“constellation of states”)的觀念似乎已告結束，南非比以前更為孤立。前史密斯內閣閣員，辛巴勃威國會中二十名白人議員之一的克郎吉 (Rowan Cronje) 在普利托里亞訪問時，提出警告說：立即採取改變的行動殊為重要，白人在羅德西亞所學的最重要的教訓是：遲疑接受改變，便意味着在一年半載之內，會失去更多的東西。

南非的外交政策中本來有兩項主要的衝刺：第一是將南非塑造成西方在經濟和戰略方面重要基地的形象；第二是對非洲其他國家表示善隣政策。此項途徑所根據的假設是：國家之間雖然內部政策彼此不同，仍然可能在貿易或其他經濟方面合作。

可是，西方國家在第三世界、尤其是在非洲國家的壓力下，反而向南非施展壓力，要求其改變種族政策。遠在一九七七年五月，美國副總統孟岱爾在維也納就對伏斯特總理說：美國將來的政策將視南非政府願意解除種族歧視的程度而定^①。因此，南非外交的第一個衝刺，在事實上已經受到了相當的挫折。

甚至在倫敦蘭加斯特宮 (Lancaster House) 會議後不久，歐洲經濟社會九國就同意給予辛巴勃威「海外領土」的地位，也就是說辛巴勃威大多數的出口貨物可以免稅進入歐洲共同市場。歐洲經濟社會委員會於本年六月底開始和辛巴勃威談判，安排後者加入第二次洛美公約 (Lomé Convention)。此一公約是於本年初所簽訂，規定了歐洲經濟社會對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五十九國的發展，提供援助，以及它們的出口貨物進入歐洲共同市場的特權。歐洲經濟社會九國加上一般所謂 ACP 五十九個國家，構成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貿易集團，西歐希望辛巴勃威與歐洲保持關係，而不致於投入蘇俄集團或者南非的懷抱^②。

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南非鄰近的九國——安哥拉、波扎那、莫三鼻克、坦尚尼亞、尚比亞、辛巴勃威、馬拉威、賴索托和史瓦濟蘭，也就是最可能受到南非共榮政策影響的九國，在路沙卡舉行經濟高峯會議。此一會議的目的和使命很簡單，就是九國一致希望減少對南非的依賴。大會主席卡瑪爵士 (Sir Seretse Khama) 說：「經濟解放的鬭爭將比政治解放的鬭爭更為激烈」，為了避免過份刺激南非，他接着說：「我們的目標並不是設計對付任何人或任何國家，相反的，而是要在南部非洲奠定新經濟秩序發展的基礎和鑄造一個聯合的社區。」

大會發表了一項邁向經濟解放的宣言。此項文件一方面承認「南部非洲依賴南非共和國為運輸和交通的中心、貨物和服務的

註① Guy Arnold, "Which Way in Southern Africa?" *Africa Report* (Vol. 25, No. 4) July-August, 1980, pp. 41-43.

註② "Zimbabwe: EEC Hagging,"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20, No. 14) June 18 1980, p. 1.

輸出者以及貨物和廉價勞工的輸入者」；一方面又表示與會九國希望打破這種依賴南非的情況，並且釐定了四項發展的目標：(一)減少對外經濟依賴，但不僅是對南非的依賴，(二)建立一個真正和公平的區域整合，(三)動用資源，促進民族的、國際的和區域政策的實施，(四)協調行動，俾在經濟解放戰略的架構內，保證國際性的合作。

緊接着九國高峯會議之後，歐洲經濟社會主管援助和發展的官員契斯遜(Claude Cheysson)到達索斯柏里，瞭解援助辛巴勃威的可能性。他說：歐洲經濟社會不僅將為辛巴勃威，而且對其隣近各國，提供發展援助。因此，南非外交的第二個衝刺也已面臨挑戰^④。

在一九八〇年代開始之際，南非的處境是：第一、南非向外看的政策已面臨停頓狀態。第二、辛巴勃威的獨立，已經鼓勵了國內改革的力量，並且刺激隣近國家尋求依賴南非以外的其他途徑。同時辛巴勃威的力量不再消耗於內戰，而可使其成為本區域在經濟上僅次於南非的國家，至少可以取代南非成為馬拉威、波扎那和史瓦濟蘭等國輸入的來源。第三、辛巴勃威的隣國——尤其是波扎那和莫三鼻克，能够減少對南非的依賴^⑤。

南非朝野懷着信心進行改革

改變之風，事實上早已越過了桑比西河。南非的「分別發展政策」就是一個重要的反應。可是此一政策迄未成功，三個獨立的自治區——川斯凱、波布那和文達，至今尚未獲得國際承認；而黑人領袖對分別發展制度的態度亦很分歧。因此南非朝野再度掀起了改革的浪潮，希望解決這一多元社會的種族問題。

南非的主要反對黨——進步聯邦黨設立了一個由史拉勃特(Frederik van Zyl Slabbert)擔任主席的「四人委員會」，於一九七九年起草了一個南非和平改變的憲政計劃，明白的拒絕黑人多數統治的原則，提議建立聯邦政府的制度並且實施地方分權。此項計劃包括了許多制衡的措施，以確保沒有一個團體能控制其他團體。這些保障措施包括在聯邦議會中對新的立法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少數民族否決權；各政黨享有比例代表權，以保證少數黨在國會中亦有代表；在憲法中附有保護個人的權利法案。

根據史拉勃特委員會的建議，所有成人——黑人、雜色人、亞洲人和白人均有投票權，稱之為「普遍成人選舉」，而不是帶有感情意味的「一人一票」。此一計劃的目標在本質上是要建立一個「意見一致的政府」。史拉勃特計劃召開全國會議，討論所有有關問題，但有兩項原則不在商談之列：那就是「全體公民權利不分膚色、種族和性別的區別」；「沒有一個團體能控制其他團體」。

註④ Arnold, op. cit., pp. 43-44.

註⑤ Ibid., p. 44.

南非黑人對史拉勃特計劃的反應並不完全贊同，並且特別批評少數民族的否決權，是一項「阻礙」，許多黑人也不喜歡監督不同文化團體利益的所謂「文化委員會」(“cultural councils”)，並譴責史拉勃特委員會拒絕明確的多數統治原則。南非教會理事會(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秘書長杜屠主教(Bishop Desmond Tutu)則指責——此一計劃「旨在維持現狀，保留政權在一個少數民族手中^⑥。」

南非政府設立了一個舒萊勃克委員會(Schlebusch Commission)對現行憲法進行調查。南非總理包沙(Mr. Pieter Botha)於本年五月八日宣佈：他的政府已經接受了委員會臨時報告中的建議，允許雜色人和印度人在未來管理國家的事務中提供有限度的意見。舒萊勃克委員會建議於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起，撤消現有的參議院，代之以一個由六十位白人、雜色人、印度人和中國人所組成的「總統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由副總統(Vice-State President)擔任主席，但僅有諮詢的權力。舒萊勃克委員會並建議增加二十位國會議員，依照國會中各政黨領袖比例任命之，根據目前的陣容，執政的國民黨(National Party)(NP)將增加十七個新席次，在野的進步聯邦黨(Progressive Federal Party)(PFP)將增加兩席，新共和黨(New Republic Party)(NRP)則增加一席，舒萊勃克委員會也建議讓南非黑人經由他們自己的諮詢委員會，參與政治性的決策。

各方對舒萊勃克委員會的建議反應複雜。蘇威托十人委員會(Soweto Commission of Ten)的領袖摩特拉那博士(Dr. Ntatho Motlana)，批評此項建議為「浪費納稅人的錢」，認為：任何修憲建議不著眼於主要的黑人問題，就是浪費時間。他說：此項建議企圖使雜色人和印度人與白人結合在一起，對付黑人。

舒萊勃克委員會中的進步聯邦黨委員們所提的一項報告，反對設立「總統委員會」，其理由是黑人被排斥在外。他們說：另外設立一個黑人的諮詢委員會「不會促進南非憲政和平發展的過程。」他們並且反對增設二十位國會議員。

雜色人自由黨(Coloured Freedom Party)領袖阿斐利加(Mr. Afrika)表示歡迎此項建議。他說：「總統委員會」包括雜色人的代表，意味着雜色人在南非的歷史上第一次對國家的事務享有發言權。可是雜色人勞工黨(Coloured Labour Party)，領袖寇利(Mr. David Curry)則表示，此項建議不能接受，並且強調現在正是接受黑人同為南非公民的時候。

國會中的三國反對黨反應亦不一致。進步聯邦黨表示反對，是因為黑人遭受排斥。可是新共和黨領袖勞萬錫(Mr. Vanse Raw)認為：委員會的建議是南非種族溝通新時代的開始。南非黨(South African Party)(SAP)領袖魏萊(Mr. John Wiley)對於此項報告則深表愉快，他說：白人、雜色人和印度人已經聚在一起，坐在一張桌上，這是正當時候採取的正當步驟。

中央華人協會(Central Chinese Association)主席福德(Mr. Ford)說：華人社區非常愉快的接受國會中的代表權，並將盡其最大的努力以任何可能的方法來協助政府。可是，他指出：華人社區非常小，因而不能提供有價值的協助；它是個少數

註⑥ "South Africa: Liberal Worries,"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21, No. 13) July 4, 1980, p. 3.

民族團體，祇希望過和平的生活。

約翰紐斯堡的「星報」(The Star)評論稱，舒勒勃克委員會的建議儘管有這些缺點，但仍不失為南非憲政發展中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也是自一九一〇年來即已存在的某些機構的結束以及建立嶄新機構的朕兆。這些建議更代表着過去的突破：躍進一個尚未被人知道的將來，所以它們應該是對已經存在的一個毫不模稜的改進。

五月二十日開始的一項過程，將導致南非已有七十年歷史的西敏寺憲法的結束，並代之以一個迄今尚未界定的新政府的形式，第一個步驟是國會兩院聯合會期已一致同意在憲法中重新保障語言的權利；包沙總統形容聯合會期的決定是一個憲政時代結束的開始和一個新時代的前夕。他說：「我們不知道明天會帶來什麼，我們不是先知。這是在黑暗中的一步，我們祇能懷着信心，邁向未來。」內政部長兼憲政委員會主席舒萊勃克(Mr. Alwyn Schlebusch)也說：「吾人將以忠實而嚴肅的努力以求獲得盡可能實際和可行的途徑。」，「當前的任務是一個要求有信心和目標的人民的任務。這是一個困難而敏感的任务，而不是一個在一夜之間就能完成的任務②。」

蘇俄在南非局勢中所扮演的角色

南非共和國豐富的礦產和開普航線對西方的戰略重要性自然使南非成了蘇俄覬覦的目標。蘇俄過去在南部非洲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根據其教條所作的叫囂：例如譴責南非計劃在一九七七年八月舉行核子試爆；要求對南非和羅德西亞實施國際制裁；以及要求以軍事來解決南部非洲的政治問題。其次是提供少數小型武器——卡賓槍、機槍、地雷等等——藉使恐怖運動得以生存，以保持此一地區的動亂。

蘇俄在一九六〇年代，很少採取主動來與非洲國家建立關係。一九七七年春，最高蘇維埃主席布加寧訪問非洲，是一個轉捩點，而蘇俄干預安哥拉內戰成功，更增加了蘇俄的信心；也使全世界深切感到蘇俄戲劇性的在非洲出現③。

蘇俄著名的非洲學者卜特金教授(Ivan I. Potekhin)遠在二次大戰前就研究非洲問題。他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南非班圖民族社區之形成」(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al Community of South African Bantu)一書中明白的表示：非洲的工人階級雖小，可是將日益壯大，如果予以適當的組織起來，可以變成反帝國主義的主要力量，他明白的指出：非洲的工會是蘇俄擴展勢力的主要力量④。

註② "South Africa,"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7, No. 5) May 1-30, 1980, pp. 5670-5671.

註③ Richard Bissell, "Soviet Policies in Africa," *Current History* (October 1979) pp. 125-217.

註④ "Russia and the African Trade Union," *Intelligence Digest* (24th year, No. 279, December 1961) pp. 6-9.

因此，莫斯科滲透南非的主要工具雖然是「民族解放運動」，但亦不能將南非的黑人工會排斥在外。今天南非社會的不安顯然與工會的活動不無關係，南非的黑人勞工於一九五五年組織南非工會大會（South Africa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雖然沒有被南非政府宣佈為非法，却已於一九六七年轉入地下活動，其領導份子亦流亡倫敦。

南非境內的所謂「民族解放運動」，除力量微弱的南非共產黨之外，主要的是非洲國民大會黨和另一小黨泛非洲主義大會黨（Pan-Africanist Congress）^⑧。根據報導，非洲國民大會黨與南非工會大會間有密切的關係。該黨主席塔波（Oliver Tambo）最近發表聲明稱：「黨必須要運用所有方法，包括合法和非法的在內，來達成它的目標。」非洲國民黨「與南非所有其他愛國的力量」要「經由罷工、示威、請願以及任何其他羣衆活動，」來提高自覺的水準和組織政治活動；而武裝鬭爭為其戰略的主要因素^⑨。

南非的兩個主要民族主義運動：非洲國民大會黨和泛非洲主義大會黨受到非洲團結組織日益增加的壓力，要求這兩個運動在對南非政府的鬭爭中組成一個共同陣線，非洲團結組織設立了一個「七人委員會」（Committee of Seven）來監督兩黨的統一問題。泛非洲主義大會黨的反應殊為熱烈，而非洲國民大會黨則認為兩黨在現階段內統一起來，尚有問題。

兩黨團結的主要障礙是在意識型態方面。泛非洲主義大會黨以前指望中共，而晚近則指望西方的支持。南非的司法和警察部部長克魯格（James Kruger）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說：有跡象顯示：泛非洲大會黨有七十八人在中國大陸接受訓練，但泛非洲主義大會黨最近曾經建議由該黨、非洲民族大會黨和黑人自覺運動（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BCM）組成統一戰線。根據此一計劃，意識型態必須從屬於民族解放戰爭的需要：「重點在民族的統一，而階級鬭爭必須適應民族鬭爭」。

非洲國民大會黨長遠以來就接受莫斯科的支持；且與南非的共產黨聯盟。非洲團結組織的壓力促使該黨主席塔波（Oliver Tambo）不得不宣佈團結所有反對種族隔離的人士成爲一個民主陣線，但是該黨書記長恩索（Alfred Nzo）則說：「團結的行動旨在顛覆非洲國民大會黨」^⑩。因此，泛非洲主義大會黨和非洲國民大會黨是否會在非洲團結組織壓力之下團結起來，目前尚難預測，但非洲前線國家似乎在積極支持解放運動展開對南非的鬭爭。

莫三鼻克民族解放陣線最近向非洲民族大會黨提出忠告稱：「正統的遊擊戰在推翻南非政府的行動中將扮演一個次要的角色，非洲民族大會黨應該試圖發動一個羣衆暴動」。其實，此項政治工作已經在進行之中。爲了鼓勵民衆叛變和從事所謂選擇性的

註⑧ 關於南非共產黨與非國民大會黨的關係，請參閱拙著「民族解放運動」：莫斯科赤化南部非洲的工具，載「問題與研究」（第十七卷第三期），民六十六年十一月十日，頁三一六—三二四。

註⑨ "South Africa: New ANC Tactics?"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21, No. 3) January 30, 1980, p. 4.

註⑩ "South Africa: The Black Exiles,"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20, No. 5) February 28, 1979, p. 1.

破壞 (selective sabotage)，最重要的是不僅要建立國外的指揮站，而且要經由國內的秘密組織，或經由其他的合法組織。因此非洲民族大會黨可能與反對南非分別發展政策的黑人領袖及其他黑人工會作鬆懈的接觸^⑬。

非洲國民大會黨的發言人今年六月五日在尚比亞首都路沙卡說：非洲民族大會黨和西南非人民組織已經發動了一個鉗形攻勢，來推翻南非政府和從南非佔領中解放納米比亞。他又說：「當西南非人民組織和納米比亞人民加強他們將南非政權逐出納米比亞之際，非洲國民大會黨和南非的被壓迫羣衆及民主人士已加強在我國結束白人少數統治的鬭爭」^⑭。

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對南非政策的透視

南非外交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在促使西方，尤其是美國，瞭解南非在經濟和戰略上的重要性而予以積極的支持，可是卡特總統的人權外交以布里辛斯基「全球人道主義」的理論為基礎，已使美國與南非的關係逐漸惡化^⑮，卡特總統如果在未來的大選中獲勝，對南非的政策不可能有所改善。「非洲報導」(Africa Report)雜誌駐華盛頓記者杜欽(Richard Deutsch)曾訪問「卡特—孟岱爾總統競選委員會」(Carter/Mondale Presidential Committee)，該委員會對其所提問題，曾作書面答復稱：卡特政府對南部非洲的政策旨在促進和平，使其邁向社會正義和經濟發展。卡特政府已經在辛巴勃威尋求多數統治的和平轉移，正為納米比亞獲得國際接受的過渡安排，然後達到獨立，並將和平地從種族隔離轉移到南非所有人民充分的參與。過去三年來，此一政策的紀錄是積極而令人鼓舞的，辛巴勃威已經獨立而在和平之中，納米比亞的談判已獲得進展。美國仍如過去一樣堅持其在南非境內社會和政治改革的承諾。

當被詢及美國應否在結束南非的種族歧視和達成少數統治的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時，該委員會的書面答復稱：卡特政府已採取一連串適度的行動，表示反對南非境內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美國曾於一九七七年支持聯合國對南非的強制性武器禁運，並曾於一九七八年片面禁止美國的軍事物資和技術輸往南非。美國也強烈的支持塞黎芬牧師(Reverend Leon Sullivan)於一九七七年所發動的平等僱用原則，並且敦促在南非的所有美國公司遵守這些原則。此一立場今天仍未改變。除非南非採取遠離種族歧視和分別發展的行動而使所有南非人獲得充分的政治參與，否則，兩國的關係不會改善，且將繼續惡化。不過美國政府既不鼓勵亦不阻撓美國公司在南非的投資，並且相信這些公司憑藉它們在南非的子公司所採用公平僱用的慣例，能够在南非社會的改

註⑬ "South Africa: Black Opposition Tactics,"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21, No. 11) May 21, 1980, pp. 4-5.

註⑭ "South Africa,"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7, No. 6) June 1-30, 1980, p. 5712.

註⑮ 關於卡特總統對南非的政策，請參閱拙著「美國對南非共和國的政策」一文，載《問題與研究》(第十八卷第十一期)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十日，頁二六四—二七五。

革過程中，扮演一個積極縱令是有限的角色。——因此，美國政府繼續敦促南非的領袖們應在悲劇發生之前，尊重和促進他們所
有人民的人權和政治權利^①。

卡特總統對南非的政策以「人權」為基礎，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雷根則認為非洲的基本問題是「美蘇之間的權力鬭爭」。一九七六年卡特當選後不久，雷根即曾指出：俄國人在非洲已佔優勢。他當時的結論是：「非洲問題是瞄準着我們的一支俄製武器。」雷根所作有關非洲的聲明並不多，而且大部份與蘇俄在第三世界的野心連在一起。例如，雷根在一九七八年曾說：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型態在非洲大陸上是否有其前途，幾乎並不重要。俄國人為了戰略的理由和為了控制不可或缺的資源而決心獲得重要的基地：安哥拉、莫三鼻克，支持羅德西亞恐怖份子，而現在正在非洲之角。他又說：蘇俄在機會來臨時能及時利用機會，他們的古巴軍團也能聽命行動。蘇俄在非洲的目標殊為明顯：控制從紅海到大西洋的海洋運油路線以及南非的礦產富源。

在一九八〇年的總統選舉中，雷根有意避免對特殊的外交政策建議作單獨性的評論。不過在他的競選演說中，雷根曾抨擊卡特對非洲的外交政策為優柔寡斷、姑息和漫無目標。雷根認為蘇俄在基本的軍事力量方面領先美國，因為卡特總統已讓俄國人向前躍進。因此他在今年初向芝加哥外交協會演說時宣稱：「只要我們明白的向蘇聯領導階層表示：我們決心對抗……我們就能經由力量獲得和平與安全」。他並強調：「和解政策大部份是一種幻覺而不是東西之間關係的一項現實。」

雷根相信，美蘇競爭的「現實」，應該成為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的基礎。他說：「我們必須率先向其他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的國家，指出我們制度的優越……我們能夠指出新加坡、臺灣、南韓已經避開馬克斯主義和社會主義而憑藉私人企業、節儉和努力工作贏得繁榮的國家……共產主義對保證終生工作和獨裁者是好的，可是對經濟發展而言是可怖的，這是我們必須讓全世界人民知道的一項事實。」

雷根於一九八〇年初任命了一個外交政策和安全顧問小組，委員們都是區域問題的專家。不過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東西雙方的關係上，或者是蘇俄對第三世界的政策上，而主要關切的是美國的安全。

雷根的高級國家安全顧問是艾倫，是一位冷戰鬭士，不情緒化，實事求是，直率的不信任俄國人。

雷根對南部非洲問題的想法受到杜格南博士(Dr. Peter Duignan)的影響最大。後者是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非洲和中國研究的主任，他在提出美國應與南非「和解」的立場時表示：「我們應該擴大而不是減少與南非在學術、文化、外交和經濟方面的接觸，我們在語調上應該溫和，在意志上應該堅決，暗暗施展壓力以求改變，逐漸結束種族隔離……使都市的黑人有更多的自治，在自治區更為民主：這些都是可以達成的目標。」

註① Richard Deutsch, "Interview President Jimmy Carter," *Africa Report* (Vol. 25, No. 4) July-August, 1980, p. 10.

杜格南博士又指出：「卡特政府的錯誤是將南非的情形與喬治亞州的民權運動相比。」杜格南認為美國的禁運不可能促使南非作種族政策的改革，美國需要南非的戰略礦產、黃金，也需要繼續使用南非所控制的開普航線和海軍設施。他又表示：「關於道德的考慮，南非雖有它的限制，但是它比古巴、或者俄國、或者中共，有更多的自由。」

他的結論是：由於華盛頓不願捲入與蘇俄在非洲的武器競賽，蘇俄的擴張正在繼續邁進，並已直接或間接的捲入了非洲的六個戰爭，因此美國需要重新思考其在非洲的政策。就戰略、市場與原料而言，非洲對美國殊為重要。因此美國應譴責蘇俄和古巴在非洲的擴張，對南非和法國維持區域安全的努力，非但不應加以抨擊，而且應該給予慎重的支持。

雷根未來對非洲政策的另一位顧問，可能是史坦福研究所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的阿德曼博士 (Dr. Kenneth Adlman)。渠為一位全球戰略家，具有堅強的非洲事務背景。阿德曼認為南部非洲是美國利益特別敏感和脆弱的地區。在他看來，南非的軍事能力雖能輕易的消弭黑人的任何傳統式遊擊戰，其經濟力量亦能對付西方迫使普利托里亞改變種族政策的企圖；但是南非的戰略將來會遭到困擾。面對國內積不相容的種族主義，如果沒有一個根本的重新安排，南非無論採取任何戰略選擇，仍將是其朋友的重負，和其敵人的一項目標。

因此，阿德曼主張美國與南非間的正式政治關係，應該保持距離，而逐漸增加私人的接觸，俾在經濟、貿易、投資和相互安全等方面加強來往。這種政策應包括援助南非的黑人，以加強他們影響改變的能力。

不過，他也建議美國和南非恢復軍事方面的關係。他認為美國在這個危險而不安定的時代中，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應該重啓有益於美國安全的所有重要孔道。現在的戰略策劃必須允許在一個可怖的緊急情況下能使用南非在西門士鎮和德班精密的海軍設施^⑤。

總之，在南部非洲局勢發展的過程中，究竟會發生何種程度的衝突以及何種的國際干涉，目前尚不易推測。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現政府，已經將其政策從支持白人而轉為支持黑人多數統治。除非雷根在未來大選中獲勝，而修正美國對南非的政策，此一趨勢，恐將持續下去。不過就南非的戰略地位與戰略資源而言，在未來世界上的任何強權外交政策中，南非共和國仍將列為優先考慮之一。

註⑤ Richard Deutsch, "Reagan's African Perspectives," *Africa Report* (Vol. 25, No. 4) July-August, 1980, pp.4-7